



B.J.Pol.S. 38, 247-272 Copyright 200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10.1017/S0007123408000136 在英国印刷。

政治参与的新形式。寻找专家型公民和日常的创造者

李耀军和大卫·马什*。

政治参与度的下降已经引起了政治学家和政治家们的广泛关注。本文以亨利克·邦的 "专家型公民"和 "日常创造者"的概念为基础，将其作为政治参与的新形式。利用2001年内政部的公民调查，我们确定了四种类型的政治参与者。政治活动家、专家公民、日常创造者和非参与者。我们评估了这些不同类型参与者的社会人口和文化因素。然后，我们继续探讨政治参与的类型与政治信仰/行动的两个领域之间的联系：政治信任和效力；以及政治接触和声音。我们的分析表明，在所调查的两个领域中，参与者的类型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支持我们发展Bang的概念化的新的政治参与形式，作为实证研究的有用工具。

近年来，政治参与问题得到了大多数自由民主国家的学者、记者和政治家们的高度关注。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投票、党员和其他主流政治活动减少的担忧。

¹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政治参与的工作越来越多，也许就不足为奇了。²

在英国，Pattie、Seyd和Whiteley提供了最新的关于参与的定量研究，我们在本文中多次讨论。³然而，正如Marsh、O'Toole和Jones所认为的，他们对 "政治"和政治参与的概念理解得很狭窄。⁴此外，有趣的是，Pattie、Seyd和Whiteley对 "政治"和 "政治参与"的概念进行了分析。

* 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变革研究所；以及伯明翰大学社会学系，分别。

¹例如，在英国，2001年大选的投票率为59%，比1997年低12个百分点，比1950年战后最高的84%低25个百分点。在2005年的选举中，投票率确实有所上升，但仅为61%。在年轻人方面，情况甚至更加令人不安。MORI的数字表明，18-24岁的人的投票率从2001年的39%下降到2005年的37%。

<www.mori.com/polls/2005/election-aggregate.shtml>

。与此类似，英国各政党的成员总数仅有英国最大的利益集团--皇家学会的一半多一点。

见D. Marsh T. O'Toole和S. Jones, 《英国的年轻人和政治》。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6), p. 2.

²例如，见M. Henn, M. Weinstein和D. Wring, "A Generation Apart?英国的青年和政治参与", *英国政治和国际关系杂志*, 4 (2002), 167-92。

³C. Pattie, P. Seyd and P. Whiteley, *Citizenship in Britain: 价值观、参与和民主* (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4年) ; 以及P.Norris, 《人口的凤凰》 (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2年) 。

⁴Marsh、O'Toole和Jones在《英国的年轻人和政治》一书中，对现有的政治参与文献提出了四点批评，而Pattie、Seyd和Whiteley只对其中的第一和第四点进行了部分豁免。他们认为，这些文献(i)对政治进行了狭义的定义；(ii)将这种狭义的政治定义强加给受访者；(iii)将冷漠视为参与的主要（如果不是唯一）"另类"，而许多公民并非冷漠，而是疏远于正式政治；(iv)将一种特殊的、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公民身份和民主观点强加给受访者，而许多人并不接受。另见T.O'Toole, D.Marsh and S.琼斯, "政治素养是双向的。年轻人不参与的政治", 《政治季刊》, 74 (2003), 349-60。

对最近关于政治参与研究的局限性的批评性文献关注甚少，尤其是没有提到亨里克-邦的工作，而这正是本文的重点。⁵

亨里克-

邦的工作代表了政治参与文献的一个有趣的发展，因为它承认了现有文献的弱点并试图超越它。⁶不幸的是，在我们看来，它没有得到充分的考虑。⁷Bang认为，大多数主流政治参与文献都集中在可以被视为"搭便车"的问题上：人们不参与，但他们确实"享受"了公民身份的好处。⁸粗略地讲，这种观点认为关键问题在于公民，而不是国家；他们是冷漠的，需要鼓励他们参与。然而，这种观点反映了Marsh、O'Toole和Jones所指出的文献中的弱点。⁹

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的那样，Bang敦促我们超越对"搭便车"问题的关注，转而关注排斥问题。在他看来，公民并不冷漠；相反，他们被一个不允许他们有"真正的"，即有效的声音的政治体系所疏远。因此，如果他们参与，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条件，而不是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因此，Bang认为，当代自由民主国家的特点不是越来越多的政治冷漠，而是有不同类型/形式的政治参与。这是一个有趣而重要的论点。然而，它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实证检验，而这正是本文的目的所在。本文分为四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并简要批评了Bang的工作，为我们自己的方法和经验分析铺平道路；第二部分介绍了Bang的工作。

⁵他们只提到了马什、奥图尔和琼斯的工作，但几乎是故意误解。见Pattie, Seyd and Whiteley, *Citizenship in Britain*, p. 76, fn. 1, 回答见Marsh, O'Toole and Jones, *Young People and Politics*, pp.24-5.

⁶见，除其他外，H. Bang和E. Sorensen, "The Everyday Maker:建立社会资本而不是政治资本", 载于P. Dekker和E.

Uslaner编辑的《社会资本和参与日常生活》(伦敦: Routledge, 2001), 第148-61页; H.

Bang, "新统治者造就新公民。文化治理和日常制造", 载于H.

Bang编辑的《作为社会和政治交流的治理》(曼彻斯特: 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 2003), 第241-66页; H.

Bang, "日常制造者和专家公民。建立政治而非社会资本"(未发表的论文,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2004年); H.

Bang, "在日常制造者和专家公民中", 在J. Newman编辑的《重塑治理》中。人民、政治和公共领域》(Bristol: The Policy Press, 2005), 第159-79页。

⁷这并不是说它没有受到关注。相反，它已经被来自不同国家和学科的关注更广泛的治理问题的作者抓住了。例如，见。M. Bevir, "政府与解释。后基础主义的含义是什么？公共管理, 82 (2004), 605-25; M. Bevir 和 R.

Rhodes, "研究英国政府。重建研究议程", 《英国政治和国际关系杂志》, 1 (1999), 215-39; M.

Blanc和J. Beaumont, 《欧洲城市发展计划中的地方民主》, 《社会和经济地理》, 96 (2005), 409-

20; P. Bogason和J. Musso, 《网络治理的民主前景》, 《美国公共管理评论》, 36 (2006), 3-18; R.

Edmondson, 《社会资本。增强健康的战略？社会科学与医学》, 57 (2003), 1723-33; F. Forno和L.

Ceccarini, 《从街道到商店。意大利新的政治行动形式的崛起》, 《南欧社会与政治》, 11 (2006), 197

-222; P. Mouritsen, 《公民社会中的公民是什么？Robert Putnam, Italy and the Republican Tradition

, *Political Studies*, 51 (2003), 650-68; R. Rhodes, "Putting People Back into Networks",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7 (2002), 399-416; H. Tapio and K. Auli, "Preconditions of Democratic e-governance? A

Critical Approach', in Ari-Veikko Anttiroiko and Antti Kasvio, eds, *e-*

City. 分析坦佩雷市产生地方活力的努力(坦佩雷: 坦佩雷大学出版社, 2005年), 第409-48页; 以及L.

Torpe, "丹麦的社会资本。A Deviant Case? 斯堪的纳维亚政治研究, 26 (2003), 27-48。

⁸在这里，Bang可能对最好的理性选择理论家不公平，他们确实更有效地处理了免费乘车问题，但我们会认为他的批评确实适用于Pattie、Seyd和Whiteley。

⁹Marsh, O'Toole and Jones, *Young People and Politics*.

第二部分讨论了我们使用的数据集和方法；第三部分报告了我们的研究结果；第四部分总结了与我们的中心研究问题相关的关键发现。

介绍 "砰" 的一声

Bang和他之前的其他人一样，承认政治的个人化和以公民为导向的参与的下降，许多人将其与社会和政治社区的 "稀薄化"联系起来。¹⁰更具体地说，他指出了这一论点的两个版本。首先，是普特南对他所说的 "神秘的脱离"的看法。¹¹总的来说，普特南的论点是，这种较弱的公民参与将导致较弱的、不那么有效的和不那么有反应的政府。其次，与此相反，诺里斯以及帕蒂、赛德和怀特利的工作强调了新的参与形式的增长：诺里斯称之为 "以事业为导向"的参与。因此，Pattie、Seyd和Whiteley认为，原子化不是体现在广泛的脱离，而是体现在集体参与的减少和个人化或微观政治参与的增加。¹²

然而，对Bang来说，这些方法有两个共同的假设：第一，公民参与的目的是影响公共当局的决策；第二，公民身份的核心是围绕着 "建立强大的、情感化的道德纽带，使公民承诺以规范、负责任的方式并以共同利益的名义行事"。¹³在Bang看来，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从这个角度来看，原子化的公民群体给自由民主国家带来的关键问题是一个搭便车的问题。

相比之下，虽然Bang并不怀疑搭便车是一个问题，但他并不把它看作是关键问题。在他看来，个人化导致的不仅仅是原子化。更广泛地说，民主不只有一个核心政治问题--

而是源于多样性的不断变化的问题和挑战，而这种多样性是理解民主的关键。在邦看来，参与涉及

"政治权力和价值观在政治当局和普通人之间的情景互动中的匹配"。¹⁴他认为，这对他的立场绝对是至关重要的，"民主的政治权力关系.....是每个人都有权利和可能对政治和政策的构成做出改变。这使他对政治团结和社会团结进行了区分：政治团结更薄，关键是不以任何共同利益的概念为基础。政治团结所需要的只是在政治权力关系中的每一个人都持有一般的政治价值观，即民主需要相互接受和承认差异。"

¹⁵

Bang认为，鉴于这种观点，当代政治的关键问题是政治排斥，而不是 "搭便车"。正在发生的是政治当局与他所说的 "普通人"的脱钩，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政治体系的破坏。晚期现代性的复杂性增加，使得治理更加复杂。

¹⁰Bang, "日常制造者和专家公民", 第1页。

¹¹Robert Putnam, 'Bowling Alone:美国不断减少的社会资本', 《民主杂志》, 6 (1995), 65-78; "调入, 调出。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8 (2005), 664-83;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Civic America', *American Prospect*, 24 (1996), 34-48;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¹²Pattie, Seyd and Whiteley, *Citizenship in Britain*, chap.3, 特别是表2.3, 第81页。

¹³Bang, "日常制造者和专家公民", 第3页。

¹⁴Bang, "日常制造者和专家公民", 第3页。

¹⁵Bang, "日常制造者和专家公民", 第4页。

政治家、官僚和公司利益集团的反应是将一些群体/个人，即普通人，排除在审议过程之外。在地方、国家和全球层面上，最弱小的人和最易受伤害的人被排除在外。然而，政治当局

"不能为社会做出和执行权威性的决定，除非非专业人士接受这些决定并承认自己受到这些决定的约束"。¹⁶

在这种情况下，Bang认为，作为非专业人士对脱钩问题的回应，出现了两种新的政治身份：专家型公民；以及日常制造者。最重要的是，专家公民和日常制造者在与政治当局的关系中不具有合法性或反对性角色。事实上，他们的政治参与并不以国家为中心（也就是说，他们不参与国家驱动或社会驱动的活动），而是全职（作为专家公民）或兼职（作为日常创造者）参与建立和运行治理网络和反思性政治社区。

总的来说，对邦来说，随着世界的变化，参与的模式也在变化。专家型公民和日常制造者是两种新型的政治参与者，他们有某些共同的特点，但也有很大的不同。

专家型公民

这些人通常是新的专业人员，特别是在志愿组织中，但不是在政党、工会或私人公司中，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像旧的当局一样从事政治，制定和执行政策。他们与所有类型的精英和次精英打交道，包括政治和公司主义。事实上，Bang认为，许多专家型公民以前是基层活动家。因此，专家型公民需要。

- 对政治作为一种话语建构的广泛概念
- 一个全职的、重叠的、反映其整体生活方式的项目身份
- 在精英网络中行使影响力的必要专业知识
- 将谈判和对话置于对立和反对之上
- 将自己视为系统的一部分，而不是外在的、与系统对立的。

对 "专家公民"

"来说，政治是代表和参与的融合，是一种新的政治参与形式，你可以用你的知识、技能和战略判断来影响他人。专家型公民与政治家、行政人员、利益集团和媒体建立谈判和合作网络；他们发展

"网络意识"。与他们还是草根活动家时相比，他们对系统的对抗性在减弱；他们的目标是使系统成为有效的合作伙伴。因此，专家公民也是民主的资源或政治资本。特别是，他们对如何处理基于种族、性别、阶级/贫困等的排斥问题有着丰富的日常经验。

日常制造者

Bang认为，在许多方面，"日常制造者"是对 "专家公民"的回应。日常制造者不觉得自己被国家所定义；他们对国家既不冷漠，也不反对。他们不想浪费时间与国家打交道；他们更愿意在尽可能低的地方层面上参与。日常创造者通常认为

¹⁶Bang, "日常制造者和专家公民", 第4页。

在全球范围内，但在当地采取行动。他们对产生一种新的利益代表形式没有兴趣，对政党政治也兴趣不大。他们也对新的专家公民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追求自己的利益："他们（日常制造者）在政治领域中明确区分了精英网络和他们自己在当地的普通政治”。¹⁷同样地，他们不是受责任感的驱使，也不对获得影响力感兴趣；相反，他们希望有参与感并发展自己。他们的目标是鼓励Bang所说的"小地方叙事"。与专家型公民不同，他们不想塑造身份；这尤其导致了专家型公民和当地的日常创造者之间的冲突。

Bang认为，"每日创客"以日常经验为信条而生活。¹⁸

- 自己动手
- 在你所在的地方做吧
- 为了好玩而做，但也因为你觉得有必要而做
- 做临时或兼职
- 具体地做，而不是从意识形态上做
- 带着自信去做，表现出对自己的信任
- 如果需要的话，与系统一起做。

和专家公民一样，"日常制造者

"不相信代议制民主可以被拯救，无论是通过从上面引导还是从下面积累社会资本。在他们看来，普特南的"强势政府"和"厚重社区"的概念有一个实际的替代方案。日常制造者可能会投票并了解"高级政治"，但他们的政治身份并不是来自于国家公民或利益集团或社会运动的成员。他们（和专家型公民一样）关心的是如何提高个人的自我管理和共同管理的能力。在Bang看来。他们喜欢"薄"形式的民主政治社区，允许相互接受和承认差异。他们还认为，来自上层的"强大"、有效和反应迅速的政府是对他们自我治理和共同治理的永久威胁"。¹⁹

就我们目前的目的而言，Bang工作的主旨是他提出的对这两种新型参与者的识别。他认为，这些新的政治参与形式反映了社会的主要变化，它们将导致像英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的性质发生变化。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大问题，我们中的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在其他地方讨论过这些问题。²⁰然而，当然也有一些先前的问题为我们在这里的分析提供了参考。

-班氏对政治参与的新形式的分类是否穷尽了所有的可能性？

- 在像英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是否有可能确定大量的专家型公民和日常决策者？

-如果是这样，是什么导致人们参与到不同形式的参与中？

这些不同类型的参与者与政治体系有不同的关系，更具体地说，有不同程度的政治信任和效力，以及在公共事务利益方面有不同程度的接触（与公职人员）和发言权（表达不满）？

¹⁷Bang, "日常制造者和专家公民", 第24页。

¹⁸Bang, "日常制造者和专家公民", 第28页。

¹⁹Bang, "日常制造者和专家公民", 第26页。

²⁰Marsh, O'Toole and Jones, *Young People and Politics*, pp.46-51, 93-5, 101-10 and 215-17.

本文关注的就是这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概念性的，也是经验性的，将在下一小节讨论。其他三个问题是经验性的，构成我们分析的核心。

BEYOND BANG

对Bang的工作有很多批评，但有两点在这里特别重要，因为它们部分地指导了我们的经验工作。²¹首先，我们认为，像Bang那样只关注专家型公民和日常决策者是不靠谱的，尽管在他的论述中隐约承认有一类人积极参与传统政治。特别是，虽然我们同意大多数文献过分强调不参与和冷漠，但有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参与。

其次，Bang的"日常制造者"

"类别很难操作化，至少在数量上是如此。对Bang来说，"每日缔造者"

"在政治中进进出出，因此，如果他们在某个特定时间没有参与政治，我们不知道这是否是因为他们是不活跃的"

"每日缔造者"。因此，要进行定量分析，就必须知道一个人目前或以前是否参与过。因此，我们确定了四种类型的参与者，具体如下。政治活动家、专家型公民、日常制造者和非参与者。其次，Bang对"专家公民"和"日常制造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只字未提，尽管文献清楚地表明，教育、阶级、性别、年龄和种族在不同程度上与社会政治参与的水平或类型有关。

在这里，根据一般的政治参与文献，有两点是很重要的。首先，尽管少数族裔群体体现在占人口的很大比例，在2001年的人口普查中约占8%，²²

，而信仰群体，特别是穆斯林，在政治上越来越重要，但对政治参与和族裔或信仰之间的关系却很少讨论。例如，由于样本量小（ $N=3145$ ），Pattie、Seyd和Whiteley只对种族和宗教（白人/非白人，以及宗教/非宗教）进行了二元分析。相比之下，Fahmy使用了与我们这里相同的数据集，但仍然将种族划分为四组（白人、黑人、亚裔和其他），并且没有对信仰群体进行分析。²³鉴于大量关于种族多样性和种族劣势的研究证据，早就应该进行更全面的分析，²⁴

，我们在此进行分析。第二，虽然有

²¹见Marsh, O'Toole and Jones, *Young People and Politics*.

²²A. Heath和S. Cheung, "Ethnic Minority Disadvantage in the Labour Market:英国", 在A.Heath和S.Cheung, "少数民族在劳动力市场的劣势：英国"。S.Cheung, eds, *Ethnic Differences Across Countr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²³E.

Fahmy, "英国的民族性、公民权和政治参与。2001年内政部公民权调查的结果"（布里斯托尔大学。英国的公民身份和对政府的态度。项目工作文件3，2004年）。

²⁴许多研究表明，不同种族群体之间在生活机会的各个重要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例如，见V.Karn, ed., *Ethnicity in the 1991 Census* (London: The Stationery Office, 1997); F. Carmichael and R. Woods, "Ethnic Penalties in Un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al Attainment:英国的证据", 《国际应用经济学评论》，14 (2000), 71-98; A. White, 《社会焦点简介》。族裔（伦敦：国家统计局，2002年）；Y. Li, "社会资本、族裔和劳动力市场", 参与社区会议记录<<http://engagingcommunities2005.org/abstracts/Li-Yaojun-final.pdf>。

2005 >; Y. Li, "英国人口普查中的匿名记录样本（SARs）。一个独特的社会来源科学研究", *社会学*, 38 (2004), 553-72。

在英国，对投票的阶级分析一直是一个强大的传统，²⁵

，近年来，阶级作为解释变量的效用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例如，Pakulski和Waters宣称“阶级的死亡”，而Beck和Beck-Gernsheim认为它是一个“僵尸类别”。²⁶鉴于我们对这一立场的高度批判，²⁷阶级在我们的分析中占有重要地位。

数据和方法

正如我们所论证的，Bang的工作很有意思，但迄今为止，它还没有得到系统的检验。邦本人在丹麦哥本哈根的内诺雷布罗地区进行了一项政治参与研究，该地区在历史上是左翼政党和基层运动与体制斗争的据点。²⁸这导致了他关于新型政治参与的想法的发展。同样，Marsh、Jones和O'Toole利用他们在英国伯明翰的政治参与数据，试图确定他们的受访者中是否有

“日常创造者”。²⁹然而，这两项研究都是定性的。在这里，我们的目的是不同的。我们使用最好的和最相关的数据，以量化的方式确定我们是否能在受访者中识别出专家型公民和日常决策者；如果能，这些群体与我们的政治活动家和非参与者在社会人口特征方面有何不同（如果有的话）；以及这些不同类型的政治参与者一方面对政治信任和效力水平有什么影响，另一方面对接触和声音有什么影响（两个领域的详情见下文）。

我们需要从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我们并不声称已经对邦的论点进行了万无一失的经验检验，事实上，我们在下文中探讨了我们的数据的局限性。相反，我们谦虚地声称，我们使用了现有的最佳数据，并以一种在概念上有活力、在经验上可检验的方式发展了邦的概念。因此，这篇文章的价值在于，读者是否认为Bang的工作，以及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它的发展，足够重要，值得进行实证研究，如果是的话，我们的分析是否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即使不完美的研究。我们已经给出了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即在我们看来，Bang的工作很重要，值得进行严格的实证（定量）调查。第二个问题需要更详细的考虑，一旦我们介绍了我们的数据和概述了我们的分析框架，我们就会回到这个问题。

²⁵例如，见A. Heath, R. Jowell and J. Curtice, *How Britain Votes* (Oxford: Pergamon, 1985); A. Heath, R. Jowell and J. Curtice, *The Rise of New Labour: 党的政治和选民选择* (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R. Andersen和A. Heath, “阶级问题。R. Andersen and A. Heath, 'Class Matters: The Persisting Effects of Contextual Social Class on Individual Voting in Britain, 1964-97',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18 (2002), 125-38; J. Goldthorpe, 'Class and Politics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ies', in D. Lee and B. Turner, eds, *Conflict about Class: 辩论晚期工业主义中的不平等* (伦敦：朗曼，1996年)，第196-208页；G. Evans, ed., *The End of Class Politics? 比较背景下的阶级投票* (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

²⁶J. Pakulski and M. Waters, *The Death of Class* (London: Sage, 1996); U. Beck and E. Beck-Gernsheim, *The Normal Chaos of Love* (Cambridge: Polity, 1995).

²⁷见Marsh, O'Toole and Jones, *Young People and Politics*, chap 5.

²⁸在Bang和Sorensen的《日常制造者》和Bang的《日常制造者和专家公民》中报告。

²⁹马什、奥图尔和琼斯，《年轻人与政治》，第4章。

数据

没有现存的数据是专门用来检验Bang的论点的。因此,我们必须决定是否有任何数据集可以让我们检验Bang的分析,即使是以一种不太完美的方式。经过一番考虑,我们决定使用2001年的内政部公民身份调查(HOCS)。该调查共包含15,475名受访者(核心样本10,015名受访者和少数族裔促进样本5,460名受访者),受访时年龄在16岁及以上,居住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私人家庭。³⁰HOCS拥有丰富的数据,其中包括:社会人口属性;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治参与类型,我们可以据此构建我们的政治参与变量;对不同政治机构的信任;对地方和国家层面的效能感;与政府官员的接触;以及对政治和政治家的不满。³¹考虑到庞大的样本量,特别是关于种族和信仰群体,以及非常丰富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参与数据,我们认为HOCS是一个比其他英国政治参与数据集更好的数据集,包括Pattie、Seyd和Whiteley的数据集。

分析框架

本文旨在探讨各种政治参与形式/政治参与者类型的主要决定因素,以及它们对政治信任/效能的影响,进而对政治接触和声音的影响。为此,我们将首先把政治参与者的类型作为一个结果,然后作为一个解释变量。在分析的第一阶段,我们的目的是解释为什么个人会参与到不同形式的参与中。在这里,我们使用的解释变量是以前关于社会资本³²

和政治参与的研究所确定的重要变量: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作为人口统计学变量;种族和宗教作为文化变量;阶级和教育资格作为社会分层变量。³³这在图1中由箭头1显示。

³⁰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使用“英国”和“英国人”这两个词作为速记,尽管我们并不一定意味着数据中所揭示的模式可以概括到苏格兰。类似的做法,见J.Goldthorpe(与C.Llewellyn和C.Payne),《现代英国的社会流动性和阶级结构》(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87年)。

³¹调查的更多细节,包括调查表、编码和加权方案,可以在<http://www.data-archive.ac.uk/findingData/snDescription.asp?sn=4754#doc>找到。另见C. Attwood, G. Singh, D. Prime, R. Creasey等人,《2001年内政部公民身份调查。人民、家庭和社区》(伦敦:内政部研究、发展和统计局,2003)。

³²P. Hall, 'Social Capital in Britai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9 (1999), 417-61; P. Paxton, 'Is Social Capital Decli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 Multiple Indicator Assess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1999), 88-127, and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cy: An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 (2002), 254-77; Putnam, *Bowling Alone*; Y. Li, M. Savage and A. Pickles, '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England and Wales (1972-1999)',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4 (2003), 497-526; Y. Li, A. Pickles and M. Savage, '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Trust in Britain',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1 (2005), 109-23。

Y. Li 'Social Capital, Social Exclusion and Public Health', in A. Scriven and G. Sebastian, eds, *Public Health: 社会背景与行动* (伦敦: Sage, 2007)。

³³在这些变量的术语上没有一致的意见。例如,“性别”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人口学属性或社会属性。同样地,种族和宗教也可以被视为文化或人口统计学。教育有时被用作文化资本的指标(A. Sullivan, 'Cultur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Sociology*, 35 (2001), 893-912),有时被作为社会分层因素的一部分(T. Chan and J. Goldthorpe,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Theatre, Dance and Cinema Attendance', *Cultural Trends*, 14 (2005), 193-212)。我们不希望卷入任何术语的争论,我们只是在传统意义上使用这些术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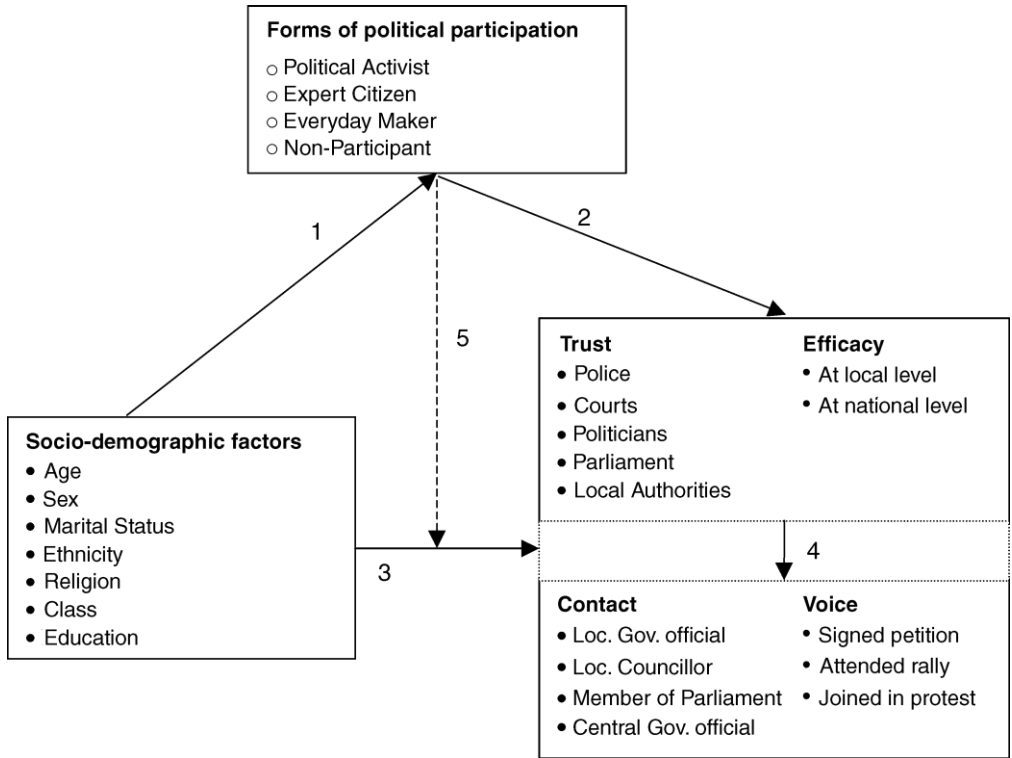


图1. 政治参与的形式、其社会文化决定因素以及对政治信任/效能和政治接触/声音的影响

注：实线表示直接效应，虚线表示调节器效应。实心圆圈指的是变量，空心圆圈指的是类别。

现有的研究也表明，政治参与与政治效能³⁴和信任有关，尽管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关系的方向还存在争议。³⁵这种关系在图1中用箭头2表示。同时，提出不同的参与形式与与政府官员的接触程度以及对政治和政治家的不满情绪的表达有关，并且信任和效能也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见箭头4），似乎是合理的。社会人口因素也可能对信任/效能和接触/发声有相当大的影响，如箭头3所示。最后，由于一些参与特定形式参与的社会人口群体的政治信仰/行为可能与参与其他形式参与的同龄人不同，我们旨在酌情通过评估互动效应来反映这一点，如箭头5所示。我们的分析调查了这些假设的每一种关系。主效应（箭头1-4）将在表格中列出，并在文本中讨论，而交互效应（箭头5）则在文本或脚注中讨论，以避免使表格过于复杂。

³⁴Fahmy, "英国的民族性、公民权和政治参与"。

³⁵Putnam, *Bowling Alone*.

指定变量

我们的关键问题是，这些数据是否允许我们充分说明我们感兴趣的主要变量的类别，即政治参与的形式，其方式足以公正地反映班的论点，并使我们能够发展他的思想。

当然，将定量数据映射到概念概念上，以及使用并非专门为研究人们感兴趣的概念而设计的数据，总是有局限性。这里的具体问题是，HOCS的数据主要只允许我们确定专家公民和日常决策者的结构特征，而不是态度特征。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受访者参与了什么类型的活动，以及这种活动是否大致符合班氏关于“新参与形式的讨论，但我们无法确定受访者对他们的参与有什么想法和感受。例如，我们不知道受访者是出于具体的还是工具性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参与，也不知道他们是出于自信还是乐趣而参与，按照Bang的说法，这两点都是“每日创客”参与的关键特征。然而，我们重申，没有任何数据集可以让我们充分挖掘Bang理论中的这些方面，我们会认为我们的规格足以抓住Bang的区别，在经验上是有用的。

因此，参与变量的构建过程是这样的。在2001年的HOCS中，有关于目前（过去12个月内）正式参与“团体、俱乐部或组织”的数据。在15个组织中提出了关于这种参与的问题[V3.1f]涵盖了。(1)

儿童教育/学校；(2) 青年/儿童活动（校外）；(3) 成人教育；(4) 体育/运动；(5) 宗教；(6) 政治；(7) 健康、残疾和社会福利；(8) 老年人。(9) 安全、急救；(10) 环境、动物；(11) 正义和人权；(12) 当地社区或邻里团体；(13) 公民团体；(14) 爱好/娱乐/艺术/社交俱乐部；以及(15) 工会活动。在每一个组织中，都有关于11个兴趣领域的进一步问题[V3.2b]包括：(1) 筹集或处理资金；(2) 领导小组/委员会成员；(3) 组织或帮助开展活动或事件；(4) 拜访/结交朋友；(5) 提供建议/信息/咨询；(6) 秘书、行政或文书工作；(7) 提供交通/驾驶；(8) 代表；(9) 竞选；(10) 其他实际帮助；以及(11) 任何其他帮助。此外，还询问了志愿者所帮助的组织的部门[V3.7]：(1) 公共部门；(2) 私营部门；(3) 志愿和社区部门；以及(4) 其他。对于那些目前没有参与但在十二个月前参与过的受访者，我们对他们以前正式参与的十一个领域[V5.1]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利用这些代码，我们构建了我们的参与变量，如图1所示的四个类别。首先，我们将政治活动家指定为那些参与人们所说的传统政治的人，即那些目前参与以政治或工会活动为特征的组织的人（V3.1f中的类别6或15）。³⁶其次，在其余的样本中，我们将专家型公民指定为那些以下列身份行事的人

³⁶没有关于投票的数据，但就邦哥而言，专家公民和日常决策者的投票率并不比其他参与者低。我们在此还要强调，我们对标准政治参与者的定义确实很窄，但这反映了现有的文献，而文章的全部意义在于，我们还区分了另外两种类型的参与者作为文章的重点，即专家型公民和日常制造者。

的领导人或代表在目前或以前正式参与的兴趣领域（V3.2b或V5.1中的第2类或第8类），对于那些目前参与的人，他们帮助的组织是在私营部门之外的（V3.7中的第1、3或4类）。第三，“日常制造者”

“被定义为目前或以前参与的人，但不是以上述定义的政治活动家或专家公民的身份。最后，非参与者是指那些在过去十二个月或十二个月前没有以三种活动家身份中的任何一种做志愿者的人。”³⁷

如图1所示，我们还探讨了政治参与者的类型与政治信仰/行动的两个领域之间的关系：信任/效能；以及接触/声音。这两个领域中的每一个都由两个子集组成，其中的变量数量不同。信任是针对警察、法院、政治家、议会和地方当局进行评估的；效能是指一个人能够影响影响地方和国家层面的决策的感觉；接触包括与为地方议会工作的公职人员联系、与地方议员联系、与议会议员联系或与为中央政府工作的公职人员联系；声音包括签署请愿书、参加公共会议或集会、或参加公共示威或抗议活动。³⁸

我们将从描述性分析和统计模型两个方面来探讨我们的四组政治参与者与政治信仰/行动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关联。在建模方面，由于本文的篇幅限制，我们无法对这两个领域的14个变量中的每一个都给出结果，我们使用了基于项目反应理论（IRT）的技术³⁹

，以获得每个领域的分类指标变量的潜变量分数。⁴⁰这样得到的分数被标准化（平均值为0，标准差为1），这样我们就可以轻松地比较不同社会人口属性和政治参与者类型的相对影响。

我们在此简要介绍一下社会人口学变量的情况。根据1991年的人口普查，民族性是作为一个八向变量来操作的。白人、黑人

³⁷四组政治参与者是通过使用2001年HOCS中V3.1f、V3.2b、V3.7和V5.1的问题组合构建的。这些问题的细节可在<http://www.data-archive.ac.uk/doc/4754/mrdoc/pdf/4754userguide1.pdf>（最后访问日期为2006年10月12日）的第150、154、157和162页上找到，包括详细的定义和对采访者的解释。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在此不作详细转载，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很容易地查到。对这些问题没有提供有效信息的20名受访者被从分析中剔除。

³⁸关于信任[V2.5]，见<http://www.data-archive.ac.uk/doc/4754/mrdoc/pdf/4754userguide1.pdf>第148页。请注意，对雇主、威尔士议会和大伦敦议会的信任没有进行分析。关于功效的问题在[V2.4]中提出，见第147页。同样，对威尔士和大伦敦的功效没有进行分析。在[V2.1a-V2.1c]中提出了关于接触和声音的问题，可在第145-6页查阅。在[V2.1a-V2.1c]中针对威尔士或伦敦的回答没有被分析。对问题的所有解释也可在这几页中找到。给受访者和采访者的说明中明确指出，这些问题是关于“公共事务”的，因此，个人问题的接触或通过工作的接触是不需要编码的。

³⁹关于IRT的简要讨论见附录2（可在<http://www.ccsr.ac.uk/staff/yaojun.htm> >）。模仿。关于经典的论述，见F.Lord和M.Novick, 《心理测试分数的统计理论》(Boston, Mass.: Addison-Wesley, 1968)。最近的权威论述，见A. Skrondal和S. Rabe-Hesketh, *Generalized Latent Variable Modeling: 多层次、纵向和结构方程模型* (伦敦: Chapman & Hall/CRC, 2004)。另见Li, Pickles和Savage, “社会资本和社会信任”，关于IRT模型在社会资本研究中的应用。

⁴⁰见D.Rubin, “推理和缺失数据”, *Biometrika*, 63 (1976), 581-92; 以及B.Muthe'n, “潜变量分析。Growth Mixture Modelling and Related Techniques for Longitudinal Data”, in D. Kaplan, ed., *Handbook of Quantitative Methodology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2004), pp.345-68。

加勒比海、非洲黑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孟加拉人、中国人和其他。⁴¹宗教也被编码为一个八向变量。基督教、佛教、印度教、犹太教、穆斯林、锡克教、其他和无。因此，我们的方法标志着在政治参与文献中对这些变量的处理向前迈进了一大步⁴²

，我们的分类不仅在社会学上比现有文献中使用的变量更有意义，而且在操作上也适合进行多变量分析。

阶级是用一个三向的Goldthorpe阶级模式来衡量的，区分了服务阶级（专业人员、行政人员和管理人员）、中间阶级（小资产阶级、日常非体力劳动者、工头和低级技术人员）和工人阶级（熟练、半熟练和非熟练体力劳动者，包括农业劳动者）。⁴³由于数据是从16岁以上的人中收集的，我们的受访者中有相当多的人仍在接受教育，他们被分配到一个单独的类别：学生。然而，我们在以下分析中的重点是服务阶层和工人阶层之间的对比。关于学历，我们根据受访者的最高学历进行了区分：第一学位或以上；文凭/A-levels；贸易学徒/O-levels；和小学/无。

为了解决选择概率不平等、子群体间不同的无应答以及少数族裔群体代表性过高的问题，我们对综合样本的个人层面分析使用了适当的加权变量，在描述性分析中使用分析性加权，在推断性分析中使用概率加权。

分析

我们按照图1所建议的程序介绍我们的发现。关于社会人口因素与政治参与形式之间的关联（箭头1），也就是Bang没有考虑的问题，我们先介绍一个总体情况，然后再看净效应方面的结果。随后，我们将研究政治信仰/行动两个领域的潜在因素得分，并在多变量分析中使用它们来解读参与形式和社会人口因素之间的相对影响。表1中的数据显示了社会人口学变量与政治参与形式之间的关联。在表的底部，我们可以看到，在提供政治参与信息的15454名受访者中，8.4%是政治活动家，15.0%是专家型公民，37.3%是日常制造者。因此，60.7%的受访者参与了各种形式的"政治"活动，而39.3%为非参与者。

关于四组政治参与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我们发现，年龄是一个可预测的关键因素。⁴⁴中年人

⁴¹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Attwood等人的《内政部公民权调查》和Fahmy的《英国的种族、公民权和政治参与》使用的数据与我们这里的相同，但他们的分析与我们的分析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阿特伍德等人主要对探索交叉分析中显示的基本关联感兴趣，而不是专注于任何特定的理论或社会学主题（例如，见其表5.2和相关讨论）。如前所述，Fahmy只使用了一个四向的种族变量，没有分析信仰团体。

⁴²Pattie, Seyd and Whiteley, *Citizenship in Britain*.

⁴³Goldthorpe, *Social Mobility*.

⁴⁴这一结果证实了帕蒂、塞德和怀特利在《英国的公民权》中的结论，即中年人更有可能参与，表3.4，第27页。

表1 参政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按行排列的百分比)

	政治活动家	专家公民	日常制造	非参赛者	N
<i>年龄</i>					
16-24	3.9	11.2	44.1	40.8	1,813
25-39	8.9	14.0	40.3	36.8	5,152
40-59	11.7	18.1	35.2	35.0	4,657
60 +	6.1	14.1	33.1	46.6	3,824
<i>性生活</i>					
男性	10.9	16.1	34.4	38.6	6,861
女性	6.1	14.0	40.0	39.9	8,594
<i>婚姻状况</i>					
从未结婚	7.5	12.3	39.5	40.8	4,270
已婚	9.8	17.2	37.1	35.9	7,552
一旦结婚	5.6	12.4	34.6	47.4	3,617
<i>民族性</i>					
白	8.6	15.7	37.4	38.7	9,353
加勒比黑人	6.1	10.8	38.0	45.2	1,004
非洲黑人	8.3	15.5	33.2	43.1	703
印度	5.3	7.5	36.8	50.3	1,332
巴基斯坦	3.9	8.4	28.9	58.8	945
孟加拉人	2.9	10.9	27.5	58.7	580
中国	2.6	11.1	41.7	44.7	148
其他	4.9	9.9	36.4	48.8	1,390
<i>宗教信仰</i>					
基督教	8.2	15.5	37.4	38.9	9,271
佛教	7.7	19.0	29.0	44.4	110
印度教	5.4	8.2	39.2	47.1	778
犹太人	7.0	34.0	30.9	28.1	51
穆斯林	3.9	9.1	27.3	59.7	2,195
锡克教	3.9	6.1	37.4	55.3	388
其他	11.9	16.8	33.9	37.4	469
无	9.6	13.2	38.6	38.6	2,193
<i>级别</i>					
服务	12.8	21.6	40.5	25.0	4,062
中级	7.3	15.0	37.1	40.6	4,296
工作	6.1	8.3	32.8	52.9	5,943
学生	4.7	16.4	44.9	34.0	1,154
<i>教育</i>					
学位+	14.6	25.3	40.4	19.8	2,519
文凭/A级	11.3	17.3	42.5	28.9	3,314
贸易应用/O级	7.0	14.0	38.0	41.0	4,218
初级/无	4.2	8.3	30.6	56.9	5,404
<i>全部</i>	8.4	15.0	37.3	39.3	15,454

注：在本表和随后的表格中使用了综合（核心和少数族裔提升）样本，其中有加权百分比（或建模表中的系数）和未加权的受访者。

资料来源。2001年内政部公民身份调查是本表和其他表格的来源。

他们比其他年龄段的人更有可能成为政治活动家或专家公民。年轻的群体更有可能成为普通的追随者（日常制造者），而最年长的群体最有可能不参与。这里的模式与最近的研究结果相呼应，即英国的年轻人更多地参与到松散的社会关系中，而不是正式的公民组织中。⁴⁵性别差异不太明显，尽管男性（10.9%）比女性（6.1%）更有可能成为政治活动家，而女性同样比男性更有可能成为日常决策者。在婚姻状况方面的明显差异表现在两个方面。⁴⁶首先，已婚者一般比未婚者（从未结婚或曾经结婚）更有可能成为政治活动家或专家公民。其次，曾经结婚的人（丧偶、离婚和分居）最有可能成为非参与者，这可能是他们年龄特征的反映。事实上，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一半以上的曾婚者都在60岁以上。

如前所述，由于缺乏数据，对英国政治参与的研究对种族或宗教背景的阐述相对较少。我们有第一个数据可以充分探讨这种关系。我们的分析显示了一些有趣的特点。首先，与基于年龄、性别或婚姻状况的差异相比，民族-宗教差异似乎更大。⁴⁷就种族而言，在少数民族群体中，非洲黑人最有可能成为政治活动家和专家型公民（分别为8.3%和15.5%），华裔最有可能成为日常决策者（41.7%），而巴基斯坦人和孟加拉人最有可能成为非参与者（各近59%）。在宗教方面，犹太裔人最有可能成为专家公民（34%），而锡克教徒的比例为6.1%。穆斯林和锡克教徒成为政治参与者的可能性最小（分别为59.7%和55.3%）。当然，这里有一个密切的联系，进一步的分析表明，97%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裔的受访者是穆斯林，而13%的印度裔受访者也是穆斯林。

阶级和教育差异的影响远比迄今为止考虑的其他个人属性要明显，有趣的是，阶级的影响比帕蒂、塞德和怀特利报告的要大得多。⁴⁸因此，服务阶层中34.4%的受访者是“政治活动家”或“专家公民”，而工人阶层中只有14.4%。另一方面，近53%的后者和只有25%的前者都属于非参与者群体。当然，阶级似乎对

⁴⁵Y. Li, M. Savage and A. Warde, 'Social Stratification' (unpublished paper, Institute for Social Chang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在HOCS中也有关于非正式帮助的数据，即在过去12个月中给予非亲属的无偿帮助，见[V6.1] <<http://www.data-archive.ac.uk/doc/4754/mrdoc/pdf/4754userguide1.pdf>>第165页。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两个较年轻的群体中，约有72.4%的人向非亲属提供了这样或那样的无偿非正式帮助，而在最年长的群体中，这一比例为56.8%。

⁴⁶婚姻状况和参与之间的概念性联系在于，15个组织中的一些组织与家庭生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由于已婚者比从未结婚或曾经结婚的人更有可能有孩子，并且居住稳定，他们更多的参与到孩子的教育/学校和/或邻里团体中。进一步的分析证实了这一点（详细情况可供索取）。

⁴⁷进一步的分析证实了这一点。将表中所有的社会人口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将政治参与作为结果变量进行序数逻辑回归分析，我们发现民族-宗教变量比年龄-性别-婚姻变量（ $\chi^2=90.09$ ，6个自由度）产生更大的卡方值（ $\chi^2=158.89$ ，14个自由度），而且这两组变量之间的差异在0.05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chi^2=10.45$ ，1个自由度， $p=0.001$ ）。

⁴⁸Pattie, Seyd and Whiteley, *Citizenship in Britain*, Table 3.4, p. 86 and Table 6.12, p. 182.

这里的问题。教育群体之间的差异甚至更为明显。拥有学位或更高学历的人成为政治活动家或专家公民的可能性是只有小学或没有正式学历的人的三倍左右（39.9%对12.5%），而后者同样比前者更有可能成为非参与者（近57%对近20%）。

我们已经描述了社会人口群体和政治参与形式之间的关联。然而，这些变量中的许多变量显然是相互关联的。⁴⁹为了看清净效应，我们在表2中显示了多项式Logit回归的结果。⁵⁰我们将“非参与者”作为基础组，其他各组--政治活动家、专家型公民和日常决策者--

都与非参与者进行了对比。我们发现，这些模式总体上加强了表1中出现的那些模式。在保持模型中所有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发现年轻群体不太可能参与传统政治（政党政治或工会，40-

59岁的群体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或承担正式的领导角色，但更有可能成为日常决策者。⁵¹女性参与传统政治的可能性比男性小，但更有可能以其他身份参与，特别是作为普通人的参与者。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统计模型可以揭示出在描述性分析中仍然不明显或隐藏的模式。因此，在模型中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从未结婚”组和“曾经结婚”组都比已婚组在三个活动家群体中的可能性小，这种模式在表1中几乎看不出来。

宗教，而不是种族，似乎是支撑参与的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因此，在所有其他社会人口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穆斯林在任何一个积极分子群体中的可能性始终较小，而且在三个对比中的两个中明显如此，而他们的种族出身并没有造成任何明显的差异。事实上，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来自印度、巴基斯坦或孟加拉国的穆斯林在三个对比中都没有明显的差异。关于专家公民，必须指出的是，犹太受访者是最积极的，在所有信仰团体中，他们的正系数最大（0.720）。⁵²

表2中最突出的模式涉及阶级和教育。在控制了模型中的所有其他因素后，我们发现阶级，特别是教育，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就系数的大小而言，学位持有者和学历最低者之间的差异，以及服务阶层和工作阶层之间的差异，一般来说，始终比其他变量中的类别的差异大。表2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阶级效应与专家型公民关系最密切，教育效应与政治活动家和专家型公民都有关系。因此，在控制模型中所有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服务阶层（与在模型中设定为0的工人阶层相比）的系数为0.510、0.943和0.521，学位持有者（与无资格者相比）的系数为1.926、1.852和1.067。

⁴⁹例如，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超过四分之三的有学位的人被发现在服务阶层，而在教育程度最低的群体中，近60%的人属于工人阶层。

⁵⁰我们还进行了上述的序数逻辑回归分析，假设这四个类别有一个固有的顺序，如“政治活动家”比“专家型公民”“有更多的政治资本，而后者又比“日常决策者”“有更多的政治资本，等等。这些模式是相同的，但多项式逻辑分析揭示了顺序逻辑分析中没有显示的特征，因此，我们更倾向于前者。

⁵¹这证实了帕蒂、塞德和怀特利的结论，《英国的公民权》，表3.4，第86页。

⁵²尽管该系数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 $P=0.24$ ），但我们必须记住，如表1所示，样本中只有五十一个信仰犹太教的受访者。

表2 政治参与人的多指标Logit回归系数（与“非活动家”对比）

	政治活动家	公民专家	日常制造者
年龄			
16-24	- 0.766**	- 0.435*	0.285**
25-39	- 0.036	- 0.269**	0.151*
40-59	0.489***	0.149†	0.133†
60 + (ref.)			
性生活			
女性	- 0.389***	0.028	0.249***
男(参考)			
婚姻状况			
从未结婚	- 0.192	- 0.457***	- 0.304**
曾经结婚	- 0.443***	- 0.314***	- 0.189**
已婚(参考)			
民族性			
白人 (参考)			
黑人 加勒比人	- 0.381*	- 0.371*	- 0.081
非洲黑人	- 0.234	- 0.227	- 0.289*
印度	- 0.253	- 0.602**	0.020
巴基斯坦	- 0.362	- 0.384	0.091
孟加拉人	- 0.439	0.121	0.133
中国	- 1.723***	- 0.942*	- 0.265
其他	- 0.632**	- 0.597**	- 0.072
宗教信仰			
基督教 (参考)			
) 佛教	- 0.164	0.092	- 0.488
印度教	- 0.663†	- 0.566*	- 0.383
犹太人	- 0.156	0.720	- 0.123
穆斯林	- 0.628*	- 0.489	- 0.789***
锡克教	- 0.884*	- 0.782*	- 0.593**
其他	0.199	- 0.019	- 0.173
无	0.001	- 0.247*	- 0.077
级别			
服务	0.510***	0.943***	0.521***
中级	0.018	0.541***	0.216***
学生工作 (参考)。	0.259	1.233***	0.535***
教育			
学位+	1.926***	1.852***	1.067***
文凭/A级	1.478***	1.197***	0.803***
贸易应用/初级/无(参考)	0.769***	0.803***	0.442***
级别			
恒定	- 2.416***	- 2.041***	- 0.835***
伪R ²	0.059		
N	15,430		

注：带有稳健标准误差的加权数据。由于提出的数据量很大，没有显示标准误差和95%的置信区间，但可应要求提供。（这也适用于下面的模型表）。

†p < 0.10, *p < 0.05, **p < 0.01和***p < 0.001。

公民和日常的创造者。还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政党政治和工会活动曾经是工人阶级男子的家，但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它逐渐转移了阵地，因此，它越来越多地，而且目前主要是由中产阶级职位的人组成。⁵³

表2的第三个重要特点是，如果考虑到模型中的所有其他因素，一些民族宗教团体的政治参与相对较弱。例如，华裔在传统政治中以及在新的参与形式中担任领导角色方面都明显不足。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穆斯林、锡克教和印度教社区缺乏参与。加勒比黑人在政党或工会活动中，以及在新的参与形式中担任领导角色的人数也不足。

当然，我们在表2中列出的结果是主效应。因此，可能涉及到我们的模型没有调查的互动效应；也就是说，人们可能会认为，并不是中国人、穆斯林或黑人本身阻碍了受访者成为政治活动家、专家型公民或日常决策者，而是有其他因素，也许是他们相对薄弱的社会经济地位，使他们的参与度降低。我们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来检验这一假设。结果得到了部分证实。例如，在模型中控制了所有其他因素后，来自黑加勒比或黑非洲或华裔的人，或信仰穆斯林的人，如果担任服务类职位或有学位资格，与他们的白人同龄人没有统计上的差异；但有学位资格的印度人被发现比白人同龄人更不可能成为积极的参与者（- 1.368， - 1.089和 - 在三个对比中分别为0.996）。

总之，这些模式表明，社会人口因素，特别是阶级和教育，对不同形式的政治参与的产生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宗教信仰也相当重要，但种族差异的影响相对较小。虽然这种模式显示了社会分层的持续解释力，正如主流阶级分析家所期望的那样，但它们对后结构主义者提出了经验上的挑战，后者长期以来一直宣称阶级的死亡被基于生活方式或文化身份的划分所取代。⁵⁴

在详细讨论了社会人口因素对政治参与形式产生的相对影响之后，我们现在来讨论社会人口因素和政治参与形式对图1所示的政治信仰/行动两个领域的影响。我们首先用政治信任和效力这两个子集分析信仰领域，然后用政治接触和声音这两个子集分析行动领域。如前所述，在进行统计建模之前，我们将首先在描述性层面上探讨这些关联。

⁵³利用2004年最新的英国家庭小组调查，我们发现47%的工会成员来自服务阶层，只有27%来自工人阶层。关于这方面的进一步讨论，见M. Savage, Y. Li和G. Tampubolon, "重新思考社会资本的政治。挑战Tocquevillian的观点", 见R.Edwards、J.Franklin和J.Holland编的《社会资本。Concepts, Policy and Practice》(London: Sage, 2006), pp. 70-94; Hall, "Social Capital in Britain"; Li, Savage and Pickles, "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Exclusion"; and Y. Li and A. Pollert, *The Unorganized Worker in WERS 2004: 社会人口属性、工作场所特征和工作-生活经验* (伦敦: 贸工部和RSS, 2006年)。

⁵⁴Pakulski and Waters, *The Death of Class*; A. Elliott and C. Lemert, *The New Individualism* (London: Routledge, 2006); and D. Denney, *Risk and Society* (London: Sage, 2005)。

表3 对政治信任/效能有正面回答的受访者百分比

	政治活动家	专家公民	日常制造	非参赛者	全部
信任					
警察	78.8	84.4	81.6	77.3	80.1
法院	73.4	74.7	74.6	68.8	72.3
地方政府	50.6	52.8	51.9	49.3	51.0
议会	37.7	38.2	35.8	33.3	35.4
政治家	24.3	23.4	21.9	23.0	22.8
效能					
在地方一级	56.9	53.1	44.8	34.9	43.4
在国家层面	33.9	26.5	24.7	20.2	24.0

在这里，Bang的分析会使我们预期，与日常决策者，特别是与非参与者相比，专家型公民会对政治机构有更大的信任，尽管不一定是对这些机构的现任者，而且会觉得在地方和国家层面上更有效力。如前所述，在政治信任方面有五个问题，在效能方面有两个问题，每个问题有四个类别。就信任而言，其类别为(1)很多；(2)相当多；(3)不太多；和(4)完全没有。对于效力，类别是(1)绝对同意；(2)倾向于同意；(3)倾向于不同意；和(4)绝对不同意。为了便于表述，我们将前两个类别合并为交叉表中对信任或效能的积极反应（表3），但在构建模型的潜变量分数时保留了这四个类别（表4）。

表3中关于信任的数据显示，英国人对不同种类的政治信任有着非凡的理解。大多数人对警察或法院等政治机构的信任程度很高（分别为80%和72%），对政治家的信任程度相当低（23%）。这个梯度非常明显，与美国现有的信任研究相呼应。⁵⁵关于四组参与者之间的差异，我们发现，主要的分界线是三个积极的参与者群体和非参与者群体之间。既然如此，专家型公民也比日常制造者表现出更大的信任。

谈到政治效能，⁵⁶我们发现人们倾向于相信他们能够影响影响地方而不是国家层面的决策。在这方面，Bang对地方和全球层面的区分似乎并不精确。邦的期望是，专家型公民在国家 and 地方层面都会感到比日常更有效力。

⁵⁵帕克斯顿，"美国的社会资本在减少吗？这里指出，人们对议会的信任度很低。这可能是由于问卷中关于议会的措辞不准确，没有将议会作为一个政治机构或作为那里的政治家的行为加以区分。这也可能是由于这两个项目（政治家、议会）是相继提出的，所以受访者可能很快就把议会与管理议会的人联系在一起，而媒体报道的议会行为经常达不到人们对他们的期望。

⁵⁶我们在Campbell等人的意义上使用"效力"一词，认为"个人的政治行动确实对政治进程产生了影响，或者可以产生影响.....这是一种感觉，即政治和社会变革是可能的，而且公民个人可以在实现这一变革中发挥作用。引自Fahmy，"种族、公民身份和政治参与"，第9页。

决策者有经验支持，但他认为后者会在当地采取行动，但在全球范围内思考，这一概念定义不明确，因此难以证实。地方一级的效率比国家一级的高得多，这表明人们认为白厅的决策是遥远的，很少受到他们自己努力的影响，这一点并不奇怪。⁵⁷

在探讨了政治参与形式与信任/效能之间的基本关联后，我们现在开始进行统计建模（见表4）。如前所述，潜在的分数的被标准化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容易地比较各种解释变量的影响。⁵⁸为每个子集构建了三个模型。在模型1中，只包括四组政治参与者作为解释变量；在模型2中，加入了人口统计学和民族宗教变量；最后，在模型3中加入了阶层和教育。由于加入更多的解释变量往往会削弱之前所包含的变量的影响，因此，当我们从较简单的模型到较复杂的模型时，我们会预期受访者的政治参与形式与我们的结果变量（信任和效能）之间的关联会更弱。关键问题是：新变量的加入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了政治参与形式的影响？⁵⁹

⁶⁰在表4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信任方面，政治活动家和专家型公民往往有相似的分数的，但他们的分数明显高于日常决策者，而日常决策者又明显比非参与者更信任，即使在人口和种族-宗教（模型2）以及阶级和

⁵⁷由于对两个疗效问题的回答是多重编码的，因此有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探讨这种关系。我们在附录1的表1中提出了两组这样的分析（所有的附录表格都可以在<http://www.ccsr.ac.uk/staff/yaojun.htm>中找到）。在第一组中，我们分别报告了地方和国家层面的功效的Logit回归模型的结果。在第二组中，我们采用多叉逻辑分析，以LocN NatN（在地方和国家层面都不具疗效）为参考类别，基于由两个二元反应安排构建的四向变量，如下所示。

	国家是	全国没有
当地是	地区国家	地区国家
当地没有	当地国家	地区N NatN

如表1所示，在控制所有其他社会人口因素的情况下，我们发现，在"地方"的标题下，三个活动家群体的效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梯度（政治活动家、专家型公民和日常决策者分别为0.584、0.432和0.226，都非常显著）。然而，在国家层面的效能方面，我们没有发现专家型公民的数值明显更高。人们可能会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之一是，这种分析忽略了回答的多重回复性质。观察多叉Logit部分的数据，我们发现三组人在地方和国家层面的效能方面都有明显的梯度，在地方而非国家层面也有梯度，但在国家而非地方层面没有差异。因此，多项式对数分析中的模式更好地反映了参与者群体之间关系的性质。

⁵⁸关于信任和效能的因子负荷，以及各组参与者的平均标准化分数，见附录1的表2。这两个分数之间的相关性为0.42，在0.001水平上有意义。

⁵⁹在表4的底部，我们列出了模型2比模型1和模型3比模型2的拟合度提高的信息。正如预期的那样，额外的变量块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

⁶⁰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与"日常制造者"相比，"专家型公民"倾向于明显地更信任和更有效率（在信任方面 $p=0.011$ 、 0.003 和 0.096 ，在效率方面 $p=0.000$ 、 0.000 和 0.000 ）。尽管模型3中两组信任度的差异在常规标准上只有微小的意义，但我们认为它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因为该模型控制了许多社会人口因素。我们感谢编辑和一位审稿人提醒我们有必要对这个关键点进行分析。

表4 政治信任和效能感的标准化分数的回归系数

	信任			效能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政治资本						
政治活动家	0.192***	0.230***	0.141***	0.492***	0.475***	0.363***
专家公民	0.220***	0.242***	0.143***	0.336***	0.331***	0.211***
日常制造	0.135***	0.144***	0.089***	0.210***	0.205***	0.136***
非参赛者（参考）						
年龄						
16-24		0.013	- 0.106*		- 0.027	- 0.140**
25-39		- 0.045	- 0.123***		0.107***	- 0.006
40-59		- 0.075**	- 0.123***		0.088**	0.019
60 + (ref.)						
性生活						
女性		0.027	0.049*		0.020	0.049*
男(参考)						
婚姻状况						
从未结婚		0.059	0.044		0.033	0.024
曾经结婚		- 0.011	0.016		- 0.071**	- 0.034
已婚(参考)						
民族性						
白色（参考）。						
加勒比黑人		- 0.193***	- 0.186***		0.203***	0.216***
非洲黑人		0.299***	0.255***		0.230***	0.193***
印度		0.192*	0.175*		0.045	0.028
巴基斯坦		0.207*	0.216*		0.105	0.120
孟加拉人		0.232*	0.268**		0.159	0.203†
中国		0.428***	0.352**		- 0.005	- 0.066
其他		0.203***	0.178***		0.056	0.036
宗教信仰						
基督教（参考						
）佛教		0.018	0.014		0.521**	0.519**
印度教		0.127	0.109		0.106	0.088
犹太人		- 0.205	- 0.256		0.023	- 0.028
穆斯林		0.178*	0.194**		0.134	0.169†
锡克教		0.077	0.089		0.178†	0.198†
其他		- 0.297***	- 0.323***		0.091	0.066
无		- 0.084**	- 0.098***		0.003	- 0.014
级别						
服务			0.147***			0.144***
中级			0.038			0.024
学生工作（参			0.278***			0.163**
考）。						
教育						
学位+			0.273***			0.378***
文凭/A级			0.118***			0.213***
贸易应用/初级/无(参考)			0.127***			0.209***
级别						
常数	- 0.165***	- 0.154***	- 0.254***	- 0.218***	- 0.291***	- 0.422***
R ²	0.008	0.021	0.039	0.026	0.034	0.057
模型比较，F		17.40 ^a ***	24.80 ^b ***		8.33 ^a ***	33.82 ^b ***
N	15,418	15,395	15,395	15,418	15,395	15,395

注：^a指模型2中附加在模型1中的术语。^b指模型3中的条款是模型2中的附加条款。†p < 0.10, *p < 0.05, **p < 0.01. ***p < 0.001.

教育（模型3）被考虑在内。这里的证据支持了班氏对专家型公民和日常决策者的区分。关于与社会人口因素相关的模式，人们可以发现年龄的形状有些凹陷。此外，来自加勒比海的黑人，以及那些有“其他”或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往往有较低的信任度。最后，在模型中所有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处于较高阶级地位和具有较高教育资格的人往往具有较高的信任水平。

谈到表4中的效能数据，我们首先发现，与信任相比，不同形式的政治参与有更明显的梯度。政治活动家的得分高于专家型公民，而专家型公民的得分又明显高于日常决策者，而日常决策者的得分又明显高于非参与人。此外，由于信任和效力的分数被标准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与每个活动家群体相关的效力系数的大小都高于信任的系数。换句话说，不同形式的政治参与与效能的关系似乎比与信任的关系更密切。这里的模式再次支持了Bang的区分的启发式价值，尽管我们对他的工作的发展导致了一个四类变量似乎更有用。在这里，对不同社会人口群体所显示的效力模式和信任模式的比较也是很有意义的。在信任方面，如上所述，年龄显示出明显的凹形，而在效能方面则显示出某种程度的凸形。这意味着，与最年轻和最年长的群体相比，25-

59岁的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不太信任，但认为自己更有效力。⁶¹与白人参照组相比，加勒比海黑人的信任度较低，但更相信自己的功效。非洲黑人血统的人既信任又有效力。至于其他种族群体，他们的信任水平较高的模式并不适合于效力。阶级的影响在这两个子集中是相似的，而教育的影响在效力方面比信任更强。教育的显著影响与政治参与形式的影响大小相当，表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往往具有更高水平的信息处理、批判和分析能力，这些能力对政治参与至关重要，就像对公民参与一样。

订婚。⁶²

最后，在这一节中，我们将讨论政治参与形式与政治接触和声音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我们假设政治参与会产生更大的信任和效力，⁶³，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到

⁶¹这证实了Pattie、Seyd和Whiteley《英国的公民权》中的结果，表2.18，第67页。然而，进一步的分析表明，造成这种差异的不是年轻人本身，而是社会经济地位。在最年轻的群体中，那些处于服务阶层的人，或有大学学历的人，或作为政治活动家或专家公民积极参与的人，对效能的信念并不比他们的参照群体少。

⁶²教育是否产生了“批判性话语文化”或信息处理能力，很难确定。见A. Gouldner, *The Future of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London: Macmillan, 1979), and Chan and Goldthorpe,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Theatre, Dance and Cinema Attendance", for respective arguments. 无论机制如何，正如Li、Savage和Pickles（《社会资本与社会排斥》）在公民参与方面所认为的那样，经济（阶层）和文化（教育）资源都是有效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这似乎是合理的。

⁶³当然，我们承认，如果没有小组数据，很难确定因果关系。Li、Pickles和Savage使用英国家庭小组调查，“社会资本和社会信任”，表4显示，即使考虑到先前的信任水平（在第8波测量），第7波的非正式社会资本对第10波的普遍信任有积极影响。虽然他们的分析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具有先前信任的人更有可能首先拥有更高水平的非正式社会资本，但它确实表明，非正式社会资本有助于产生信任。

表5 过去12个月内参与公民活动的情况（给予肯定回答的百分比）

	政治活动家	专家公民	日常制造者	非参赛者	全部
联系了为你的地方议会工作的公职人员	28.1	22.0	14.8	9.5	14.8
联系了当地的一位议员	20.2	13.7	9.1	5.3	9.2
联系了一名国会议员	14.4	8.7	5.1	2.0	5.2
联系了为中央政府部分部门工作的公职人员	8.7	5.0	2.4	1.0	2.8
签署了一份请愿书	40.0	29.6	26.2	12.6	22.5
参加了公共会议或集会	20.8	12.7	6.7	2.1	7.0
参加了公共示威或抗议活动	6.6	2.3	1.2	0.6	1.6

政治接触和声音。表5显示了基本模式，我们发现15%的受访者曾与在地方议会工作的公职人员联系过，10%的受访者与地方议员联系过，23%的受访者签署过请愿书，等等。比较不同参与群体的回答，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模式，即政治活动家最积极，其次是专家型公民，然后是日常决策者。非参与者更不可能进行这样的接触或行使这样的话语权。

表6中的数据是关于接触和声音的标准化分数的回归系数。⁶⁴在每个部分，我们同样有三个模型。与表4不同的是，这里我们在模型2中包括了所有的社会人口学变量，如前所述，在模型3中我们增加了信任和效能的标准化分数。

表6中显示的模式非常清楚。三个积极分子群体的系数在所有三个模型中都是显著的，对接触和声音都是如此。⁶⁵梯度也是很明显的。政治活动家、专家型公民和日常制造者的系数大致为3：2：1；当我们从模型1转到模型3时，影响的大小并没有减少多少。这表明，我们根据Bang的理论预期构建的参与变量，相当好地反映了人口在进行政治接触和行使政治话语权方面的差异。

关于社会人口变量的影响，我们发现，如模型2和3所示，进行接触和行使话语权主要是白人、中年、中产阶级和男性的活动范围。因此，年轻群体、妇女、未婚者和少数民族出身的人明显不太可能为了公共利益而与政府官员接触或以各种形式的抗议来表达他们的不满。

⁶⁴关于接触和声音的因子负荷，以及各参与群体的平均标准化分数，见附录1的表3。
⁶⁵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在每个模型中，专家型公民在接触和声音方面的得分都明显高于日常制造者（ $P = 0.000$ ）。

表6 接触和声音的标准化分数的回归系数

	联系我们			声音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政治资本						
政治活动家	1.025***	0.853***	0.820***	1.088***	0.923***	0.886***
专家公民	0.614***	0.465***	0.450***	0.645***	0.498***	0.482***
日常制造	0.331***	0.273***	0.264***	0.372***	0.307***	0.296***
非参赛者 (参考)						
年龄						
16-24		- 0.327***	- 0.318***		- 0.231***	- 0.220***
25-39		- 0.199***	- 0.208***		- 0.146***	- 0.155***
40-59		- 0.039	- 0.052		- 0.008	- 0.021
60 + (ref.)						
性生活						
女性 男性		- 0.079***	- 0.081***		- 0.041†	- 0.043†
(ref.)						
婚姻状况						
从未结婚		- 0.087*	- 0.087*		- 0.082*	- 0.082*
曾经结婚		- 0.072*	- 0.066*		- 0.070*	- 0.064*
已婚(参考)						
民族性						
白人 (参考)						
黑人 加勒比人		- 0.089*	- 0.129*		- 0.096*	- 0.140***
非洲黑人		- 0.137**	- 0.140**		- 0.183***	- 0.188***
印度		- 0.154†	- 0.144†		- 0.149†	- 0.139†
巴基斯坦		- 0.136*	- 0.133		- 0.115	- 0.111
孟加拉人		0.049	0.049		- 0.010	- 0.013
中国		- 0.353***	- 0.316***		- 0.384***	- 0.344***
其他		- 0.137*	- 0.126*		- 0.171**	- 0.159**
宗教信仰						
克里斯蒂安(Ref.)						
佛教		0.239	0.177		0.327	0.258
印度教		- 0.093	- 0.094		- 0.129	- 0.131
犹太人		0.391†	0.373†		0.371†	0.352†
穆斯林		0.157	0.155		0.111	0.106
锡克教		0.104	0.087		0.069	0.050
其他		0.168*	0.132*		0.205*	0.168*
无		0.049	0.042		0.046	0.041
级别						
服务		0.084*	0.079*		0.081*	0.074*
中级		0.022	0.022		0.012	0.012
学生工作 (参考)。		0.032	- 0.029		0.005	0.017
教育						
学位 +		0.396***	0.372***		0.394***	0.368***
文凭/A级		0.260***	0.244***		0.258***	0.239***
贸易应用/初级/无(参考)级别		0.110***	0.095***		0.121***	0.103***
信任			- 0.085***			- 0.088***
效能			0.123***			0.134***
恒定	- 0.233***	- 0.188***	- 0.157**	- 0.243***	- 0.256***	- 0.222**
R ²	0.086	0.124	0.134	0.096	0.126	0.138
模型比较, F		14.19 ^a ***	40.66 ^b ***		11.14 ^a ***	48.29 ^b ***
N	15,454	15,430	15,395	15,454	15,430	15,395

注：见表4的脚注。

事务。⁶⁶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如两个子集的模式3所示，信任与接触和声音呈负相关，而效力则呈正相关。这表明，人们联系公职人员或举行抗议活动，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些机构的现任者会自动把人民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之前，同时也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为公共事务的利益带来改变。⁶⁷此外，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惊讶地发现，即使模型中所有其他社会人口和民族宗教因素都得到了控制，我们的参与变量至少在系数的大小方面具有最明显的效果，而且对接触和声音都是如此。

结论

本文是对政治参与和民主治理文献的一个贡献。在概念上，我们建立并发展了Bang关于新的政治参与形式的理论，在我们看来，这代表了近期文献中最有趣的发展。然而，根据Bang更隐含的区别，我们利用了另外两个类别，即政治活动家和非参与者。我们使用了2001年的HOCS数据，在2004年10月开始分析时，该数据集是可用于我们分析的最佳和最权威的数据集。在技术上，我们使用项目反应理论模型来进行分类指标变量的潜在因素分析：这是英国政治社会学研究中首次使用该模型。从概念和技术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我们的研究标志着政治参与研究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

我们的结果是明确的。

在我们的数据足以检验Bang关于新的参与形式的论点的范围内（我们将在下文中回到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确定专家型公民（占受访者的14.5%）和日常制造者（37.3%），8.4%为政治活动家，39%为非参与者。与Bang不同的是，我们随后探讨了与不同参与形式相关的社会人口学特征。我们的参与者群体之间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人口统计学差异。政治活动家（参与政党政治和工会的人）和专家公民（正式志愿服务团体的领导者或代表）更可能是男性、中年、高学历和从事服务类工作，而日常制造者则倾向于年轻、女性和非婚姻。不参与的人很可能在老年人、离婚、分居、丧偶、少数族裔、穆斯林、锡克教徒、工人阶级或教育程度低的人中出现。同时，一个人的参与形式与她的政治信任感和效能感之间有明显的关系，反过来，她也有可能做出一些决定。

⁶⁶在模型中所有其他变量仍被控制的情况下，对交互效应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处于服务阶层或有学位资格的年轻群体与他们的年长者相比，接触或行使话语权的可能性并不低，处于服务阶层或政治活动家群体的少数族裔群体更有可能接触公职人员，但在公共事务方面行使话语权的可能性较低。

⁶⁷在双变量层面上，信任与接触（ $r=0.006$, $p=0.443$ ）或信任与声音（ $r=0.009$, $p=0.238$ ）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尽管效力与接触和声音有微弱但明显的关联（ $r=0.142$ 和 $r=0.153$ ，都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

政治接触和行使政治话语权。因此，我们认为，Bang对政治参与形式的分类，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政治参与形式的重新规范，在经验层面上是有用的。

就解释个人为何进行特定形式的参与而言，我们的分析表明，获得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是至关重要的。服务阶层（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和具有较高学历的人最有可能成为政治活动家和专家公民。这里的分析与最近的社会资本研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⁶⁸处于最不利地位的社会群体，即工人阶级和受正规教育不多的人，最不可能参与到政治上。非正式的政治参与，特别是作为政治活动家和专家公民，需要社会和文化资本，而工人阶级拥有的社会和文化资本较少，即使他们有一些，这种资本往往是不同类型的，在主流政治中不太受重视。⁶⁹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与政治参与形式之间的密切联系表明，主流政治参与文献迄今未能充分解决不参与的根​​本结构性原因。

相比之下，其他与参与形式有关的人口学差异，包括民族宗教差异，相对较小。一方面，我们确实发现加勒比黑人、穆斯林和锡克教徒成为政治活动家、专家型公民或日常决策者的可能性明显较低，但当我们控制了教育，特别是阶级时，这种影响就会大大降低。另一方面，犹太血统的人更有可能成为专家型公民。换句话说，要提高主流政治中的参与度（这一点值得商榷），至关重要的是，种族上处于劣势的人要获得文化资本，提高他们的社会流动性，增加他们的经济资本。

我们的结果表明，我们根据对Bang的批判性评估所确定的政治参与形式，有助于解释政治信任和效能水平，并通过它们解释政治接触和发言权的水平。即使控制了阶级和教育，以及其他民族宗教和人口因素，政治参与形式的变量仍然非常重要。

总之，我们的研究表明，社会分层深入到政治参与产生的领域，公民采取的政治参与形式在塑造政治信仰和行动方面也发挥着重要而独立的作用。

最后，我们不能不回到我们的数据是否足以检验Bang的分析的问题。正如我们在一开始所表明的那样，我们认识到，由于缺乏关于受访者对其政治参与的感受的数据，如“有信心地做”或“为了快乐”，这意味着我们很难以完全公正的方式来确定“每日创作者”的模型。为了更彻底地测试Bang，我们需要专门为此目的而设计的数据。虽然没有这样的定量数据存在。

⁶⁸Putnam, *Bowling Alone*; Hall, 'Social Capital in Britain'; Li, Savage and Pickles, '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Exclusion'; and Li, Pickles and Savage, '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Trust'.

⁶⁹Li, Pickles和Savage在“社会资本和社会信任”中发现，工人阶级的邻里依恋水平高于服务阶层，这是社会资本的一种类型（另外两种是公民参与和社会支持）。邻里关系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纽带资本，在关于社会资本或政治参与的主流讨论中，它比正式的公民参与更不被重视。我们把这一见解归功于本文上一版本的一位审稿人。

我们在这里的主张是，我们使用了现有的最佳数据，我们的工作具有概念上的合理性和经验上的支持。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对参与形式/参与人类型的分类，以Bang所期望的方式进行了经验性的购买，即专家型公民感觉比政治活动家的效率低，但比日常制造者的信任度和效率高得多；他们比日常制造者更多地使用接触和声音。因此，我们认为，Bang的工作和我们对它的发展值得进一步关注。